



未必佳集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未必佳集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



20996773

996773

封面设计：马少展
插页画：沈云瑞

未必佳集

WEI BI JIA JI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46,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9,400

书号 7002·48 定价 0.94 元

自序

这是我们三个的第三本习作选集，以“未必佳”作为集子的名称是我出的主意。

我们的前两本习作选集——《花萼》和《三叶》，是抗日战争后期，我们三个在父亲跟前练习写作的成绩。当时，父亲的几位朋友怂恿我们把习作编成集子，宋云彬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愿意给我们的选集写序文，还有文光书店愿意接受出版，都因为我们是在父亲的指点下练习写作的缘故。

现在仍然由于这个缘故，三联书店建议把《花萼》和《三叶》合在一起重新出版。我于是把两本集子整理了一遍，写了一篇“后记”。在“后记”中我附带说到，抗日战争以后，“我们三个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变动，不能再聚在一起跟着父亲修改习作了。一直过了三十几年，最近四年间，我们三个才互相鼓励，重新练习写作，有些短的习作还要请父亲过目。”没想到这几句话引起了三联书店编辑同志的兴趣，他们建议把我们三个四年来的习作也编成一本选集。我们想这样也好，可以让看过前两本

选集的师友和同志们看看我们过了将近四十年有没有长进，于是同意了。这就是这本《未必佳集》的由来。

“未必佳”出于《世说新语》。孔融十岁时候能说会道，受到司徒校尉李膺和他的宾客们的一致称赞，只有太中大夫陈韪说了一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的嘴真利害，马上回他一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说得陈韪目瞪口呆。《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归在言语篇内。我年幼时看了这个故事也佩服孔融的敏捷，可是觉得陈韪的话没有错：一则“未必佳”并非“必不佳”，所以孔融的逆向推理是犯了逻辑的错误；二则呢，任何人在小时候都受过他人的称赞，要是因此而自以为了不起，那就肯定会把自己的一生葬送掉。所以我宁愿记住陈韪的话，何况我“小时”实在并不“了了”。

我想：用“未必佳”作为这本集子的名称可以提醒我们三个永远不要自满，而且不限于在写作这一个方面。我把这个意思向至美至诚说了，他们都同意。

至 善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

2028/20

目 录

至善之页

挖池塘的比喻.....	3
编父亲的散文集.....	8
《文心》重版后记.....	13
《倪焕之》的电影剧本.....	17
五卅运动中的《公理日报》.....	24
徐调孚先生的《记夏丐尊先生》.....	35
七十年前的日記.....	41
等.....	47
把儿歌也动员起来.....	49
给自己立的规矩.....	52
“成才”的“蹊径”.....	57
关于《失踪的哥哥》的自白.....	60
博识家鲁迅先生.....	67
打不跑的人.....	70

让作者有感而发	73
读了《倒影集》.....	75
红杉的遭遇.....	80
罚站的叔叔.....	86
蜘蛛呀，请赐给我力量！	87

至美之页

鉴真大师的感召	111
领悟.....	115
海棠花开.....	120
粉色的连衣裙.....	126
童心.....	132
吃鱼	141
窗口的灯光.....	148
远隔重洋的拥抱	155

至诚之页

“探求者”的话	169
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173

迟开的蔷薇	176
忆方之	180
方之的死	194
跟父亲学写	196
烦难和容易	208
冒名二则	210
回声谷	212
儿时	214
倒霉的橄榄核	216
伤寒	221
体育老师	234
戒烟	238
荧惑星	245



至善
之页



挖池塘的比喻

《爱的教育》的新译本就要出版了，编辑同志要我写几句话介绍这部小说。他说：《爱的教育》的旧译本是夏丏尊先生翻译的，由开明书店出版；我是夏先生的女婿，又在开明书店当过编辑，由我来介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经编辑同志这么一说，我真觉得非写几句不可了——因为五十多年前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读这部小说，把书中的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三十多年前我当了中学教师，又把这部小说看作教育孩子的指南：《爱的教育》跟我的关系的确够深的了。现在新的译本就要问世，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它的新读者，还愿意说一说我的一些浅薄的想法。

《爱的教育》是一九二三年介绍到我国来的，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东方杂志》是成年人读的一种综合性月刊；后来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作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的一种。夏丏尊先生在《译者序言》里说：他在一九二零年得到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一边读一边流泪。他说他把自己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跟小说里写的相比，

惭愧得流下了眼泪；又说小说固然是虚构的，但是他觉得世间要象小说里写的那样才好，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当时许下愿心，一定要把这部小说译出来，不光是给孩子们读，还要介绍给父母们和教师们读，让父母和教师都跟他一样，流一些惭愧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他认为这比给孩子们读更为重要。夏先生把译文先交给《东方杂志》发表，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在《译者序言》里，夏先生把办学校比做挖池塘。他说，我国办学校以来，老在制度上方法上变来变去，好象挖池塘，有人说方的好，有人说圆的好，不断地改来改去，而池塘要成为池塘必须有水，这个关键问题反而没有人注意。他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是必须有感情，必须有爱；而当时的学校所短缺的正是感情和爱，因此都成了没有水的池塘，任凭是方的还是圆的，总免不了空虚之感。夏先生给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说作者写出了理想的教育境界，就是把学校、家庭、社会都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小说原名《心》，夏先生觉得这个书名不醒豁，不能表明内容，先想改成《感情教育》，最后决定用《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一出版就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种《教育学》或《教育概论》。有夏先生的推崇当然是个原因，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有许多教师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而这部小说给他们塑

造了一个可以让他们仿效的模型——当然，实际上体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许多中学小学把《爱的教育》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书，许多教师认真地按照小说中写的来教育他们的学生。就在我上学的那所小学里，这样做的教师就不少；有一位王志成先生还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写了一本《爱的教育实施记》，一九三〇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等到我当教师，已经是抗日战争后期了。可是在内地的中学和小学里，体罚还很盛行。打手心用竹鞭，老师一竹鞭下去，孩子们的手掌上就肿起一条杠来。每逢开学，家长把孩子领到我跟前，指着孩子叮嘱我说：“他要是不学好，给我着实往死里打。”我精神上痛苦极了，于是想起夏先生的挖池塘的比喻：我得往池塘里灌水——实施爱的教育啊！这股子傻劲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可笑，可是当时真抱着扭转局面的希望和雄心。

等到一解放，《爱的教育》就不再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或指斥呢？完全不是，停印这部小说是开明书店编辑部自己作出的决定。我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少儿读物，我是这样想的：如今解放了，咱们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切都必须改变，为了美好的前途，教育更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得立即抛弃——什么爱的教育！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现在说起来我真是幼稚得可笑，很有点儿象文

化大革命初期的“小将”。不过我想，怀着这样想法的人在当时不是个别的；《爱的教育》如果照常重印，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一本也卖不出去。可是静下心来从另一方面想一想：学校办不好是不是就因为缺少了感情，缺少了爱？是不是以感情和爱为基础，就一定能把学校办好？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夏先生的比喻并不确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讲感情，不讲爱，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我所以敢这样肯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迫作了大规模的试验，得到的结果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经过这许多年的政治学习，我相信感情是有阶级性的。我觉得，封建社会里要求尊敬老师，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求尊敬老师，咱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要求尊敬老师，但是出发点各不相同。咱们想到老师是替咱们整个社会培养有理想有能力的后一辈的，所以咱们应该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尊敬老师；决不能因为过去的社会都要求尊敬老师，咱们就得“对着干”，非把老师整得斯文扫地不可，而“四人帮”却正是这样干的。我只说尊敬老师这一个例子。为了明辨是非，为了医治创伤，把《爱的教育》重新介绍给孩子们，介绍给父母们和老师们，在目前很有好处。我想，父母和老师最好能给孩子们一些指点：说清楚小说中哪些部分是好的，咱们应该学；哪些部分还不足，咱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哪些部分不大对，咱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爱的教育》是一部好小说，但是咱

们不能还象夏先生在六十年前那样，把这部小说当作建设学校的蓝图。

一九八零年八月

编父亲的散文集

好些出版社要把我父亲的散文编成集子出版，父亲总不同意。他说翻来复去老是这几篇，自己看着都腻了，冷饭越炒越没有味儿。“炒冷饭”是父亲和朋友之间的“行话”，就指把若干篇文章翻来复去地编集子，编了一本又一本。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被禁锢达十年之久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得到了解放，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许多出版社随即争相出版“五四”以来的作品选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既然选“五四”以来的作品，那就少不了我父亲的。可是在散文方面，无非《记金华两个洞》《游了三个湖》等几篇游记；稍后出版的可能加上前年写的一篇《拙政诸园寄深眷》，连语文课本也是这样。看来选家们都有爱好游记的倾向，要不，就是我父亲的游记写得特别好了。

在报刊上还常常有分析我父亲的游记的文章，大多是供语文教学作参考的。当然都说写得如何如何好，总之尽量拔高。似乎我父亲的这几篇游记是散文的正宗，

要写好散文就得向这几篇游记学。看到这种文章，我父亲就要叹息了：“唉！我成了始作俑者。”

父亲担心的是他的这几篇游记使学生们产生这样的印象：散文就是写些闲情逸致的；要写好散文，必须寄情于山水之间。父亲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翻一翻近来非常时行的学生作文选就可以知道。这种担心我也有。我还有另一种担心，到处是这几篇游记，会不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我父亲是个散淡闲人，只知道游山玩水。

爷儿俩都担心，相形之下，我的胸怀窄得多了。父亲担心他的游记把学生们引入歧途，我担心的却是光选游记未免歪曲了我父亲：公私判然。但是请不要过于责备我，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写的散文不光是游记。去年看父亲的《语文教育论集》的校样，其中好些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是论文，而是地地道道的散文；今年看父亲的《论创作》的校样，其中散文更多。还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在四十年代，我父亲为民主运动写了不少有力量的散文。那时期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往前推，抗日战争、“八·一三”、“七·七”、“一·二八”、“九·一八”；还有“四·一二”、“三·二一”、“三·一八”、“五卅”……光是日期就有这么一大串。虽然越往前我的记忆越模糊，可是还记得，关于那些日子，我父亲都写过不少文章，若说其中没有一篇散文可以跟他的游记相比，